



晚秋，申城红枫映林、梧桐飘叶，堪与武康路媲美的陕西北路（旧称西摩路）上的荣氏老宅，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赏市民。面对斯景，我不禁忆及 34 年前在这条名街上另一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——七一中学，当孩子王的幸福时光。

七一中学的前身崇德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，1937 年“8·13”抗战中原校舍被日寇飞机炸毁后，徐松石校长飞赴美国募得巨款，很快在西摩路购置了一块土地，聘请具有西方建筑理念的建筑师设计校舍，建成了类似于美国白宫的西洋建筑（俗称“小白宫”），一直延用至今。

1983 年初秋，我从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，分进七一中学教 4 个预备班，200 多名学生的中国古代史，但翌年便因故调离了。这短短的一年，七一中学师生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，诸多往事铭刻于心，不少学生赠送我自制的贺年卡，珍藏至今。

七一中学作为重点中学，其生源素质很高，我在教学中自然地传授给学生历史视野、创新思维，其中预备（4）班的刘均同学在我的辅导下，以《义和团痛击瓦德西》为题，荣获上海市中学生历史演讲比赛二等奖。我之所以在 200 多名学生中一下子相中这个小孩，盖因其比较顽皮、有着孙猴子般的灵性，多年后方知其母是《文汇报》记者唐斯复，而唐斯复的舅舅乃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陈岱孙。近年来，刘均以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陈岱孙与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金岳霖等，于大西南昆明、李庄等地攻坚克难，科研教学

沪上“小白宫”纪事

不辍的通信等资料，撰写他们的传记，获得知识界一致好评。

走笔至此，为了尊重历史，我应坦承自己逃离七一中学的原委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学教师收入较低，更无住房可分，以我目击的七一中学名师而言，那些响当当的语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教师纷纷外出“背猪猡”（指兼夜课），而每堂课的报酬仅一元多点。我也上过一晚三节课、报酬 2 元 7 角的高复班历史课。有一名数学教师长期极度疲劳，不幸英年早逝，那天他的儿子正好在听我讲课，噩耗传来，痛不欲生。关于住房，大多数教师都是困难户。例如，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高足、史地教研组组长于伯铭老师与数学骨干教师孙国英夫妇，带着两个女儿，蜗居在 10 平方米的阴暗底层，于宅旁边是饮食店，他们天天被油烟袭击，以致于老师为撰写《道光传》，在学校的阁楼里写瞎一只眼、另一眼几近失明。历史教师李先生一家三口，苦苦挤在 6 平方米的亭子间。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同窗、教学超一流的数学教研组组长刘老师一家，只能借住学校的一间单人宿舍……

1984 年春节前夕，全校教职员在大礼堂开会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特级教师（物理学科）吴孟明校长（其祖母乃陈独秀胞姐）闪着泪光说：“各位老师，由于学校经费困难，我无法像工厂企业那样发丰富的年货，请你们谅解啊！但也请你们相信，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，你们

文 / 秦维宪

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！”结果，校方发给每位教师一个红色的塑料饭碗、两支牙膏、两支牙刷。

滑稽的是，1984 年初夏，我在南京西路跃胜百货店买了一件蓝汗衫，已穿了一天，因嫌小，便去调换，被营业员一口拒绝。情急之下，我掏出工作证，表明自己是七一中学教师，能不能高抬贵手，那营业员二话不说，立即予以调换，然我已羞得满脸呈猪肝色也。

当年，我年近而立，因出身草根，家无婚房，另一半尚在云里雾里飘，加上慈父母忧虑，而学生们居然发动家长为我找对象。在生存的压力下，我被迫忍痛调离七一中学，告别可爱的学生，跳槽到一所能分住房的党校去执教鞭。

如今，我已步入夕照愁云的晚景，回首往事，离开七一中学是人生的一大失误，因为从我的人生经历和性格来看，更适合与单纯、天真的孩子打交道。这种被物质绑架的择业观，不亚于低俗的物质主义择偶观，其所产生的遗憾与教训是沉重的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歌。当年，不知有几多星汉灿烂的夜晚，于先生在“小白宫”的阁楼里伏案奋笔疾书，而我则在办公室或备课或撰写小论文。斯时，我们办公室对面的音乐课堂里，经常溪流般传来董琦老师弹奏的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，这优美、飘逸的旋律，使得宁静的校园荡漾着诗情画意……

我深深地怀念那业已流逝的温馨岁月！



在一次老年大学书法班师生聚会上，一位年逾花甲的先生，时而为大家端茶续水，时而搬动桌椅，时而又裁剪宣纸、调研墨汁。这位不停歇的先生就是我的书法老师秦建强。

秦老师的书法笔名叫景清。1953 年出生的他与我们是同辈，是阿拉上海人。大家在一起随和融洽，亦师亦友。通过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聊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，我感到秦老师数十年的书法之路，就是一部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，形色各异的字帖，需要我们更加认真地研读和临摹。

秦老师 5 岁时，年迈的外祖父便教他练习颜书。练字是十分苦寂的。弄堂里的孩子们在玩耍喧闹，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童心。怎么办？外祖父对他施以“物质刺激”——写出好字便有 5 分钱的奖励。他写着写着，渐渐地爱上了书法，每天能自觉地练习书法了。机缘巧合，他的字被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看到了，称赞之余，遂收为弟子。

回忆起郭绍虞先生当年对他的教诲，秦老师的眉宇间立刻洋溢着幸福和感恩。他深情地说：“郭老当年是一对一为我开小灶呀！而且免我的学费。快下课时还叫人烧点心端给我吃。他不厌其烦地为我示范，使我有大视野和大局观。为了向我解释书法中的奥妙之处，都 80 岁的老人了，郭老还要在小楼梯爬上爬下找字帖。恩师之情，感人至深！”

1984 年，郭老驾鹤西去，他留给秦老师一句赠言：“60 岁之前勿以字示人”。40 多年了，秦老师始终铭记郭老的嘱托，同时作为对恩师的庄严承诺，努力地付诸实践。

秦老师授业时常现场演示书法技巧，笔法走势，一些草稿写完便随手捏成一团扔了。我们看到一些字写得实在太漂亮，就捡起来整理好带回去了。

秦老师的字很有特色，单个观赏，不落俗套；全篇审视，章法严谨。书法人都知道，笔画越少的字往往越是难写，比如这个“少”字，在秦老师笔下跌宕起伏，金石气十足。那个大

老年大学的书法老师

“撇”更是显出他的深厚功力。我们老年班十多名学员，有的人喜欢小篆隶书；有的人偏爱行书章草；有的人索求条幅对联；有的人则要唐诗宋词。现在大家都收藏了秦老师的墨宝了。最让我们佩服的是，学员们索求的一些较为冷僻的唐诗宋词，他都能倒背如流，信手拈来。

凭借一手好字，还画得一手好画，并天生一副好嗓子，秦老师的人生道路还是很顺的。他到云南建设兵团的第二年就调到宣传科工作了，返沪后进入海螺集团，繁忙的销售工作之余，仍然笔耕不辍。他的书法作品总是让海螺的客户们赏心悦目，爱不释手，使他销售业绩不断上升。一些客户总想回赠些什么或者干脆请他出国旅游，秦老师都婉言谢绝了。他说少一些无聊的活动就多一些练字的时间。难道他真的没有什么业余爱好？一次偶然的发现，才让我们了解到他的业余爱好竟然是钓鱼！

一个书法家必须要忍耐基础练习的枯燥，要忍耐长期独处的寂寞。而钓鱼不是恰恰在重复着枯燥和寂寞吗？听听秦老师是怎么说的吧：“正是钓鱼，才锻炼了我对枯燥和寂寞的耐性。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，我必须心静如水，不为周边喧嚣所动，一旦大鱼上钩，嘿嘿！在水面上溜鱼，忽快忽慢忽沉忽扬，不恰似在一张偌大的宣纸上笔走龙蛇吗？”一个痴迷的书法人的想象力是何等丰富啊！

前不久，在上海收藏文化研究所的关心下，秦老师与中国瓷都景德镇确定合作，设计制作书法、佛教、陶瓷三结合的艺术精品。其中有 18 罗汉瓷瓶，还有陶瓷板书写的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与《道德经》等大幅作品。现在，除了教授我们这些老年书法班的学员，秦老师牢记师嘱，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着力于培养下一代书法学习，已经开班授课。突然想起了郑板桥的一首小诗：“日日临池把墨研，何曾粉笔去争妍。要知画法通书法，兰竹如同草隶然。”感觉秦建强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书法家。



秦建强（六十四岁）作

老人老话

文 / 张大成

吃过苦，方知甘甜；受过累，才知香甜。

快乐，总是简单又开心；同乐，都是热闹又太平。

学写字，成本最低难度最高；学做人，成本最高难度最低。（注：学做人，吃亏是最大的成本）

与高人交往，社交有水平；与雅人交流，生活添情趣。

花前评诗，总是三分怨；酒后写字，常有七分狂。

诗词贵含蓄；文章重情感。



父亲去世已十年了，母亲离开我们也三年多。在这些无尽思念的日子里，我时常在梦中与父母相会，那也是我这段人生旅程中最幸福的时光……

父亲李佐华从小就对我寄予厚望。他不仅为我和胞弟订阅了当时所有发行的少儿杂志，还定期到新华书店，买回他认为对我们学习、成长有益的少儿读物。我对父亲买回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说唐》《岳飞》等古典人物和历史题材的连环画和书籍，非常感兴趣，于是，父亲就朝这方面培养我。每逢节假日，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的父亲，就会抽空给我讲解一些历史事件和故事。这是我非常企盼的，因为父亲的讲述，我还能依葫芦画瓢说给同学听。

父亲曾长期给我灌输他的历史观。如“历史就像一面镜子”“不知三国，哪来魏晋”“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矛盾和焦点，归根到底就是土地问题。”父亲的话语，我从小铭记在心。但由于当时年少，认知浅薄，并不以为然。在经过岁月的洗礼、生活的积淀和人生的历练后，如今我是非常能理解并十分赞同父亲的许多观点。

父亲有一个最要好的同窗王福龄（歌曲《我的中国心》《南屏晚钟》《今宵多珍重》的曲作者），两人情投意合，课余经常一同听评弹、看戏曲和学音乐，形影不离。

王福龄的钢琴课是老师登门教授的。老师是著名作曲大家陈钢的爸爸陈歌辛，他不仅教钢琴弹奏技法，还顺便讲解一些作曲的基础知识，而我父亲每次都参与旁听学习。

说来有缘，母亲陈秀英与王福龄是邻居，与其胞弟王福成又是小学同学，三人可谓一起长大。母亲在教会中学就读时，也开始学习钢琴。空闲时，还常随姐姐去电台录唱。

因此，在王福龄上钢琴课时，我母亲常常客串去听听。不经意间，我父母开始相识，因为共同的爱好和彼此的欣赏，两人互有好感，从而愈走愈近。

父亲非常喜欢写作。他退休后，又应邀到一家报社当编辑。由于秉性使然，太讲原则了，遭遇很多不快。有一次，报社领导的领导，转来一篇稿子，交由父亲刊发，按惯例刊发就是。但父亲仔细看后，觉得不合适，而且改又无从下手，于是建议退稿。父亲的这一举动，无形中得罪了领导，对今人来讲简直不可理喻。不久，这篇稿子通过另一位编辑刊发了。父亲这才明白，无奈地主动辞退了这份心爱的事业。我得知此事缘由后，就脱口说了几句父亲不识时务的话。不料，父亲不但没有接受，反而严厉地批评我，没有一点悔意。

不过，也有人赏识父亲人品的事后，每周广播电视报的领导刘继汉邀我父亲去当审读。所谓审读，就是把报上所有的错，包括错别字、标点及标题和内容的不妥等等，都要找出来转给领导审阅。其实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儿，但父亲却乐此不疲。每周报纸还没公开发行，他就要我先拿来样报，花整整两天时间，来完成“审读”，一直坚持到他中风前。